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 与中国角色

王 健 任 琳 吴洪英 刘中民 徐秀丽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

关键词 国际秩序 “全球南方” 南南合作 2023年金砖国家峰会 中东 非洲

作者简介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吴洪英，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球南方”崛起与国际秩序新变化

王 健

一 战后国际秩序面临根本性挑战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合作与冲突，国际秩序之争实际上是权利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①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认为，国际秩序涉及规则、制度、法律和规范如何产生并维持关系和行为模式。国际秩序既有物质成分，也有社会成分。^②

战后国际秩序是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秩序以及这一秩序在冷战后的扩展与延伸，突出表现为自由主义中心。它主要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进行国际合作，促进市场开放、安全合作。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国际秩序主要是在战后两极格局和冷战后“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由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虽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其有益成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与繁荣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具有明显的强权政治和所谓西方“普世价值”色彩，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后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发展的需求。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 2022 年的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导致战后国际秩序面临根本性挑战，要求改革战后国际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方面，以 2016 年美国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为标志，战后国际秩序在西方各国内部遭到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对。制造业空洞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导致美国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在

① 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载《太平洋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4 页。

② Michael Barnett, “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Ord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 No. 1, 2021, pp. 4 - 6.

“全球化不可能三角”^①假说的推动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推出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退出了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在内的20几个国际组织和条约，并以狭隘的国家利益推行“美国优先”政策。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具有国家保护主义色彩的“拜登经济学”。同时，因移民等引发的族群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思潮。英国和部分欧盟国家的情况与美国类似，民粹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崛起。所有这些，都对全球多边主义造成了巨大冲击。

另一方面，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债务危机、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全球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反映出战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世界，具有高度的互联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②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战后国际秩序及其相关机制不断“私物化”，全球治理呈现“孤岛化”趋势，国际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冲突和对抗却在日益增强。一场世纪疫情就导致许多国家的发展成果被吞噬，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全球近70个国家的8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

二 “全球南方”成为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秩序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权力决定格局，格局制定规则，规则形成秩序。以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新变化。2018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指出：“未来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80%。按汇率法计算，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③美国

^① “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的概念出自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与民主三者不可能同时成立，最多取其二。

^② [德国] 克劳斯·施瓦布、[法国] 蒂埃里·马勒著：《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3~15页。

^③ 习近平：《金砖国家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2018年7月25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45页。

高盛公司预测，到 2050 年，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和印度。^① 普华永道按购买力平价推测，到 2050 年，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南方国家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位于前两位和第四位，巴西和墨西哥等国也将位列其中。^②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推动世界格局呈现更为明显的多极化态势。由此，建立在非多极化格局基础上的战后国际秩序已不能充分反映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益诉求。“全球南方”必然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

1980 年，《勃兰特报告》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划了一条“勃兰特线”（Brandt Line），以反映当时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由于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勃兰特线”以北，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线南，因此，国际上习惯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除了经济含义，“全球南方”代表着 20 世纪反殖民浪潮中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因此它带有反帝、反殖、反霸的政治意涵。1955 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标志着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式走入世界政治舞台。1964 年成立的七十七国集团，成为联合国系统内最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联盟。^③ 2006 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2023 年，金砖国家成员数量由成立之初的 4 个发展为 11 个。“全球南方”日益以集体的形态，通过依托和改革国际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在全球议程中积极争取自身的权益。

三 “全球南方” 重塑国际新秩序

2022 年以来，“全球南方”概念日益引发国际政坛和学术界关注，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将“全球南方”视为争夺未来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支撑性力量。2022 年 12 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世界正面临着时代转型（zeitenwende），向一个划时代

① Goldman Sachs,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99, pp. 4 - 5.

② PwC, “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 p. 4, <http://www.pwc.com>, 2023 - 08 - 10.

③ Nicholas Lees, “The Brandt Line after Forty Years: The More North - South, Relation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7, No. 1, 2021, p. 86.

的构造转变。乌克兰危机结束了一个时代，新的大国已经或重新出现，包括经济强大和政治自信的中国。在新的多极世界中，不同国家和政府模式正在争夺国际权力和影响力。^①

由于美国不能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对华政策出现了错误认知。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2022年，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再次宣称：“我们正处于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之中”，并把中国视为“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想法，又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能力推进这个目标的对手”。为此，美国不仅对中国实施了全面战略竞争战略，而且还将中美竞争构建为所谓“威权”和“民主”两种体制和秩序竞争的叙事。《2023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也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描述为重新构想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基于所谓专制的威权主义国际秩序之间的竞争，并认为世界正进入争夺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十年。

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中美战略博弈和乌克兰危机中并没有“选边站队”，美西方国家对此深感焦虑。早在2012年，有学者就认为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这4个“全球摇摆国家”（Global Swing States）对国际秩序的重塑非常重要。^② 2023年4月，《经济学人》杂志将没有“选边站队”的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越南、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卡塔尔、尼日利亚等25个经济体称为“交易型二十五国”（Transactional 25）。上述国家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全球总量的45%和18%。^③ 为此，美西方国家深切地认识到，要继续主导战后国际秩序，除了西方大国之间的联盟战略外，还要积极争取“全球南方”这一中间力量。2023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其报告中多次提到要重新赢得“全球南方”的信任，并设置了“南北合作”专场讨论。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也邀请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与会，并将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作为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与此同时，美西方还试图让“全球南方”与中国“脱钩”，从而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① Olaf Scholz, “The Global Zeitenwende: 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germany/olaf-scholz-global-zeitenwende-how-avoid-new-cold-war>, 2023-07-10.

^② Daniel M. Kliman and Richard Fontaine; *Global Swing States: Brazil, India, Indonesia, Turke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GMF/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November 2012.

^③ “How to Survive a Superpower Split”, *Economist*, April 11,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3/04/11/how-to-survive-a-superpower-split>, 2023-07-10.

和塑造力。2023 年 3 月和 6 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相继通过法案，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4 年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明确将中国列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一个基本诉求就是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与发展问题，努力提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切实维护“全球南方”的利益，推进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15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时明确指出：中国“将继续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②

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国家秉持的共同主张。“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鼓吹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今后，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将与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战后国际秩序也必将由此而产生公平正义、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变化。

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中的“全球南方”

任 琳

一 关于“全球南方”的概念辨析

近年来，“全球南方”概念愈发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然而，围绕“全球南方”概念的内涵外延，国际社会并未形成共识性认定。一般来说，在国际

^① 《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307/t20230726_11117824.shtml，2023-07-26。

^② 习近平著：《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57 页。

组织中，“全球南方”往往指代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与二战后各国认定的“南方国家”概念之间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不同点。就相似点而言，二者都强调该国家群体具有相似的地理位置、发展水平和历史经历，皆用以描述主要处于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从历史维度看，这些国家曾遭受过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也因此形成了近现代积贫积弱的局面。就不同点而言，“全球南方”比“南方国家”多了一个“全球”的定语，在形式上强调了这类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给概念增加了国际政治的色彩。这里提及的国际政治色彩，既有中性色彩，由发展中国家发起，追求公正公平的待遇与权益；又包括非中性色彩，由美国为代表的既成大国发起，旨在增加对“全球南方”的掌控力，巩固等级制的国际秩序。后者系此轮“全球南方”热背后的最重要驱动力，蕴含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浓厚的主观意图。

虽然“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成员国家、确定战略目标和完善体制机构的国家集团或国际机制，但拥有类似的国际政治诉求且愈发成为全球事务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忌惮并重视这一国家群体的国际政治意义之原因。可见，“全球南方”概念在国际舞台上博得热度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大国博弈则是隐藏在背后的重要主观原因。近年来，“全球南方”概念不断被部分发达国家赋予战略色彩。它们妄图操纵“全球南方”概念，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制造排他性，进而分化“全球南方”的凝聚力且增强其掌控力，如2023年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将首轮会谈主题设定为“重新校准指南针：南北合作”。与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更是就欧盟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做出承诺。2022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邀请了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参加；继而，2023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也邀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参加。两次七国集团峰会都抛出了多项政策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诱拉。

二 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中的“全球南方”

打“全球南方”牌，炮制带有浓厚人道主义色彩的叙事，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当下国际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毕竟，“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七成，且国际社会已然看到它们在相关国际事务中的群体影

响力。若它们在重大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没有与美西方保持一致，能够带来重大的国际影响力甚至掣肘美西方战略意图的实现。这最终迫使美西方不得不对其予以高度重视，最后做出争夺“全球南方”定义权的荒唐举措。统观美西方的行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增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掌控力，要求“全球南方”在国际重大事务上与其保持一致。随着“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一支独特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更是在很多场合表现出与霸权国美国不一致的行为选择。例如，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在联合国召开的乌克兰问题特别会议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仅未获得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支持，更有 52 个发展中国家明确表示不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 2023 年 2 月，130 多个宣布不参与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针对“沉默的大多数”现象，美西方开始连连出招，诱拉“全球南方”国家。2023 年 8 月 5~6 日，在沙特吉达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并未邀请作为涉事方的俄罗斯，但在美国以及欧洲之外，会议还邀请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美西方希望借此强化对“全球南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治掌控力，诱导它们与其站在同一立场。

第二，维护自身非中性的利益，减少“全球南方”对既成的于己有利的治理体系形成冲击。“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内部对话与合作，寻求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民主化改革。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国家群体，欲通过拉拢和控制它们，进而达到缓解改革对自身利益带来的冲击。“全球南方”国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纠正既成国际金融架构中的偏见和不公，呼吁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进行有效改革，如提出增加发展中国家在执董会的代表比重、进行份额改革、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资金用途等内容。当下，这些改革的阻力相当大。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疫情防控期间，被视为发达国家代表的七国集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总计相当于 2 800 亿美元的资金，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资助总计只有约 80 亿美元。七国集团总人口约 7.7 亿，而上述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合计约 11 亿。”^①

第三，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分化瓦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团

^① See <https://fortune.com/2023/06/17/united-nations-imf-world-bank-glaring-failure-stress-test-pandemic>, 2023-08-10.

结与合作。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南方”内部刻意制造排他性的国家分类法，妄图把中国排除在外。此外，它们还妄图在“全球南方”内部制造分歧，通过塑造矛盾达到使之互相钳制的目标。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美国通过双边施压手段以期分化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试图通过拉拢或施压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其圈定的所谓“摇摆国家”^①，破坏金砖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分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总之，在贸易治理和发展治理等全球治理相关议程中，一旦“全球南方”缺乏统一立场，就更加难以在同发达国家的国际谈判中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发达国家对议事日程和治理规则的非中性设定。“全球南方”只有积极塑造并维护属于自身的全球治理平台，才能够将该群体国家“拧成一股绳”，发出同样的声音，争取更大的权益。

第四，制造所谓的“债务危机中国责任论”，分化中国与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一边积极热捧与操控“全球南方”概念，一边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妄想分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天然联系，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影响力。为达到上述目标，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所谓的“债务陷阱”叙事，在债务治理议题中只强调双边债务，绝口不提与之高度相关的多边金融机构和西方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刻意捏造所谓的“债务危机中国责任论”，而事实却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文字游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49个非洲国家负债总额合计6960亿美元，而其中有近3/4的债务来自多边金融机构与西方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②然而，这些债务类别却由于某些发达国家的操控凭空消失在讨论债务治理的国际舆论场。以上客观数据显示，某些发达国家炮制的“债务危机中国责任论”是毫无依据且荒谬的。

第五，为达排斥和制衡中国目标，把印度塑造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仅继续利用中、印两国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来分化两国，更是在近期制造出所谓“全球南方领导国”叙事来分化两国。在某种意义上，将印度塑造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是美国发起遏制中国

^① German Marshall Fund, “Alliances in a Shifting Global Order: Rethinking Transatlantic Engagement with Global Swing States”, <https://www.gmfus.org/news/alliances-shifting-global-order-rethinking-transatlantic-engagement-global-swing-states>, 2023-08-10.

^② See <https://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debt-statistics>, 2023-08-10.

“印太战略”的辅助手段，主要目的在于分化中、印两国的政治和经济立场、控制该区域局势和掌控发展中国家。印度长期具有将自身从区域强国提升为世界强国的夙愿，而争当“全球南方”领导国似乎为其提供了一个增强国际影响力的说辞。印度年初在线上举办了“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宣称“全球南方”时代正在到来，而印度则应代表全球南方国家“争取共同未来”。可见，美西方塑造“全球南方领导国”的叙事，利用了印度想成为世界大国的雄心，有助于它们以印度为翘板扩张自身在该区域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内的影响力。

三 全球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应对

虽然“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有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操纵，可能会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带来一定的矛盾和对立，但它也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机遇，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第一，亟待在“全球南方”国家内部澄清事实，使各国充分认识到部分发达国家分化中国与“全球南方”天然联系的战略意图。中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增强不可或缺的助推者。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 年至 2021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38.6%，超过七国集团的 25.7%。^①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持续增长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全球南方”整体力量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得以大大提升。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要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世界秩序的诉求高度一致，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基本利益。换句话说，一旦两者的紧密关系被割裂，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势必下降。因此，正如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所言：“全球南方”国家“要团结一致，共商合作”^②。对于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在 2023 年 8 月 22 日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深刻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③

^① See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 2023-08-10.

^② 参见《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

^③ 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 2023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2023 年 8 月 22 日，约翰内斯堡杉藤会议中心），载《人民日报》2023 年 8 月 23 日。

第二，推动“全球南方”概念的去政治化，强调“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议程应该是共同谋求发展的问题。只有坚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才能避免“全球南方”概念被部分发达国家政治化和工具化，偏离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本意。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也有助于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援助承诺，而不是简单地依靠炒作概念来逃避国际责任。回归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发展议题，还将有助于凝聚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国际共识，切实维护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筹集足够的全球发展公共产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一贯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一方面，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在国内发展治理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

第三，淡化领导权问题，倡导主要国家树立“全球发展治理利益攸关方”的正确理念。首先，客观剖析主要国家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乃至作为“全球南方”领导国的意愿和能力。领导权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基础的，印度及其背后的美西方并不具备向“全球南方”提供充足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例如，七国集团曾就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提供相应公共产品的承诺，包括援助资金和救助资金。迄今，它们不仅没有兑现承诺，还一再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其偿还此前所欠的债务。其次，以“全球发展治理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替代“全球南方领导权”叙事，强调主要国家在全球发展治理事务中的责任担当。作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大国，中国和印度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双方应摒弃外部干扰或离间，就“全球南方”普遍关心的发展治理议题增进有益的对话与合作，切实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谋福利。

金砖国家促推“全球南方”合作

吴洪英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频发，“和

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① 在国际局势大动荡、大危机、大组合、大变革叠加共振的背景下，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逆流”而上，携手合作，提质增容，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尤其 2023 年 9 月召开的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更是为动荡的世界增添了一份稳定性，为“全球南方”合作打造了一支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一 金砖国家是“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

近来，“全球南方”一词不仅成为各种报刊网络媒体使用的高频词汇，而且成为一个日益流行的国际经济政治术语。但对何谓“全球南方”？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发展轨迹和发展前景怎么样？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全球南方”通常指独立于北半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的广大南半球地区，基本上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外围地区”“欠发达地区”等概念划上等号。例如，“第三世界”一词，最早出现在 1952 年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撰写的《三个世界，一个地球》一文之中。他强调“第三世界”是指那些被排除在冷战的东西方冲突之外、曾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的贫困地区。^② 随着“第三世界”被逐渐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第三世界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获得一定的发展，于是西方学者又将其冠以“发展中国家”称号，并以“较贫穷、较脆弱，严重依赖初级产业出口”等形容词将其定性。^③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是给西方工业中心国家提供原料的地区，属于“外围”地区，由此出现了“中心—外围”提法。^④ 尽管“外围”在与“中心”交往中获得一定发展，但这种发展相当有限，因此，西方学者将这些发展有限的亚非拉地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 60 页。

② B. R. Tomlinson, “What was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8, No. 2, April 2003, pp. 307–309.

③ Nahzeem Oluwafemi Mimiko, *Globa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Global Economic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2, p. 47.

④ Dados, Nour and Raewyn Connell,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Vol. 11, No. 1, February 2012, pp. 12–13.

区称作“欠发达地区”，并且认为要摆脱“外围”状态，只有进行“进口替代工业化”。^①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第二世界出现分化，因此，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需要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分类。于是“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两个词汇开始流行开来。实际上，西方学术界最早使用“全球南方”一词作为政治术语的学者是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他1969年在《公益》杂志上发文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② 自此，“全球南方”一词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不过，直到21世纪初，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一词才快速流行起来。到2013年，“全球南方”一词已出现在数百种出版物之中。一般认为，“全球南方”一词之所以迅速流行，在于这一新词较“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两个词汇更少等级含义。不过，许多西方学界仍然认为，“收入低下、人口稠密、基础设施薄弱，往往处于政治或文化边缘”仍是南方国家主要特点。^③ 显然，“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划分和整体发展差距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问题。

中国政界和学界则普遍认为，“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北半球富裕和南半球贫穷的社会学划分，比较认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全球南方”的界定，即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不包括以色列、日本和韩国）和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④ 换言之，发达国家通常是北方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通常是南方国家。可见，在中国学者眼中，“全球南方”一词既是一个国际经济政治社会术语，还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概念。早在1974年毛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就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美、苏为第一世界，美国之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属于第三世界。这种划分应该说深刻反映了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现状。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

① Joseph Leroy Lov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conomic Structur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Dimension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0, No. 3, October 2005, pp. 100 – 125.

② Carl Oglesby, *Vietnamism Has Failed... The Revolution Can Only Be Mauled, Not Defeated*, Commonweal, 1969, p. 90.

③ Parsa Arbab, “Global and Globalizing Citi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Multiple Realities and Pathways to Form A New Order”,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17 May 2019.

④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22”,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handbook-statistics-2022>, 2022 – 09 – 21.

着“亚洲四小龙”快速发展、1986 年越南和老挝经济转型、1990 年苏联解体，“第三世界”一词已无法反映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遂被“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地区”等词汇所替代。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地区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制造业和生产活动逐渐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南合作不仅“增强了全球南方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历史潜力”，而且开始“挑战北方的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① 因此，“全球南方”一词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和认可，因为“全球南方”一词不仅有助于推动“南半球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和技术问题上进行合作”^②，而且更适合抵制“威胁这些国家自治和发展的霸权势力”^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BRICS），可谓算得上是“全球南方”的典型代表。从名称起源看，金砖国家原本是 2001 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发明的一个“人造概念”。他将横跨亚非欧的中国、印度、巴西 3 个发展中大国和俄罗斯这个转型国家放到一起，创造出一个“金砖”概念。但这一概念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结果。从发展目标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不仅是所有金砖国家谋求的最大目标，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不懈努力的方向。从发展路径看，通过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智能化、贸易自由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方式，建设一个民主富裕文明强盛的国家，不仅是金砖国家正在探索的发展道路，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正在实践的过程。从合作意愿看，金砖国家都很重视金砖合作机制，不仅将其当作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实现本国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而且视之为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影响的重要途径。从合作成果看，占世界面积 29.4%、人口 41.2% 的金砖国家^④，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总量的 25.77%、贸易量的 18%、外汇储

①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Special Unit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 September 2015.

② Kevin Gray and Barry K. Gill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No. 4, April 2016, pp. 557-574.

③ Andrea Wolvers, Oliver Tappe and Tijo Salverda, “Concepts of the Global South - Voi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https://kups.ub.uni-koeln.de/6399/1/voices012015_concepts_of_the_global_south.pdf, 2023-09-10.

④ 中国国家统计局等编：《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 2022》，中国统计出版社有限公司，2022 年版，第 20 页。

备的35%，外资流入的45%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①从发展前景看，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上最重要的5个经济体中将有3个来自南方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②世界80%的中产阶级人口将生活在南方国家。^③可见，在中国的引领下，金砖合作机制正在成为拓展发展中国家外交和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并将成为改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二 金砖国家积极推进“全球南方”合作

自2006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以来，在经贸财金、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驾马车”驱动下，金砖合作机制一路高歌猛进，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虚到实、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面对百年大变局，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疲软，全球治理赤字加重，金砖国家没有退缩，而是奋发进取，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向前发展。

第一，开展经贸务实合作，助推“全球南方”经济整体实力提升。金砖国家普遍崇尚“自由贸易”，积极推动内部双边贸易发展，不断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2022年金砖国家第12次经贸部长会议达成《金砖国家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和世贸组织改革声明》《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金砖国家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倡议》《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等成果文件，成为推动金砖国家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政策基础。经过多年不懈努力，金砖国家经济实力整体提升。贸易上，据中国海关统计，2022年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贸易额达5544.7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0年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100多个发展中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上，金砖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2001年840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3550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2001年的10.9%增至2021年的26.5%。^④经济体量上，2022年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近26.03万亿美元，略高于美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2001年

^① 刘英：《金砖国家成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载《经济日报》2023年8月30日。

^② Jo Adetunji, “The Global South is on the Rise – But What Exactly Is the Global South?”, *The Conversation*, 3 July 2023.

^③ GSSC, “Discussion on the Global South”,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3141439_Discussions_on_the_Global_South, 2023-09-17.

^④ 邓宇：《“金砖+”促进再全球化》，载《大公报》2023年9月4日。

8.03% 增至 2022 年 31.5%；而七国集团从 1982 年的 50.42% 降到 30.39%。对金砖国家来说，经济体量超过七国集团实属不易，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

第二，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全球南方”成为和平力量。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持续不断地对俄罗斯进行无底线的制裁，持续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使乌克兰战争演化成一场由乌克兰代替美国等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代理人战争”，并且正在升级为俄罗斯与整个美西方的战略对峙。面对不断升级的危机，金砖国家（除俄罗斯外）一方面坚持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另一方面，努力支持俄、乌双方展开对话和谈判，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化解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金砖国家普遍表现得理性客观，基本采取了不拱火、不输送武器、不参与对俄罗斯无底线制裁的“三不”政策，在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投票表决中，金砖国家大多持中立立场。巴西总统卢拉明确提出建立包括中、印、巴在内的“和平俱乐部”，以推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① 2023 年 2 月 24 日中国提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被称作“中国 12 点和平倡议”。中国政府还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大使出访多国进行政治斡旋。总体来说，金砖国家这种支持俄、乌对话和政治解决之道，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可和称赞，为乌克兰危机提供了“金砖方案”。

第三，携手应对疫情，推动“全球南方”成为全球抗击疫情的主力军。众所周知，中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早期受害者，巴西和印度是疫情的“重灾区”。疫情暴发以来，金砖国家不仅各自努力防疫抗疫，而且守望相助，共度时艰，尤其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抗疫物资和疫苗。金砖新开发银行也向成员国提供了 100 亿美元的抗疫特别贷款。2022 年 3 月 22 日，金砖国家启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决定在疫苗联合研发与试验、合作建厂、授权生产、标准互认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三年抗击疫情结果表明，金砖国家率先在全球范围筑起一道“金砖防线”，引领发展中国家抗疫，充分展

^① Katarína Javorceková, “The Delusion of Lula’s ‘Peace Club’”, <https://www.globsec.org/what-we-do/commentaries/delusion-lulas-peace-club>, 2023-09-18.

现金砖国家在全球卫生危机面前的“金砖担当”。

第四，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南方”成为世界秩序公正化的力量。近年，美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和利益，持续“筑小院、垒高墙”，不断拉帮结派，搞“小圈子”，行“伪多边主义”。金砖国家特别关注美欧单边制裁给世界经济复苏、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能源和粮食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呼吁遵守《联合国宪章》，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关切，确保各国经济民生不受影响，反对单边主义，反对撕裂国际社会，反对“选边站”，反对代理人战争。维护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化，成为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三 金砖南非峰会成为“全球南方”合作“加速器”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于2023年8月22日至2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这是金砖国家历史上一次划时代、开创未来的峰会，因为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容”，正式批准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六国为金砖正式成员，使“金砖五国”变成“金砖十一国”。

此次金砖“扩容增量”，不仅丰富了金砖合作机制的内涵外延，而且导致一个庞大的经济方阵形成，并显示出金砖作为“全球南方”最重要合作平台的前景。从内涵看，“金砖五国”变成“金砖十一国”，成员国数量超过七国集团，直逼二十国集团，这种扩容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从外延看，新增六国分别来自拉美、非洲和中东3个发展中地区，不仅弥补了金砖合作机制中非洲和拉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而且填补了中东代表性“空白”问题。从体量看，金砖扩容后的面积从占全球26%增至32%，人口从42%升至47%，国内生产总值从26%升至29%，货物贸易从18%升至21%。扩容后的金砖无疑成了全球经济版图中最耀眼的部分。鉴于目前还有40多个国家欲加入金砖，金砖合作机制必将进一步发展壮大，其成为“全球南方”最重要合作平台的前景依稀可见、指日可待。

此次金砖“扩容增量”，不仅意味着金砖国家合作伙伴增多，而且意味着“全球南方”的发展机会增多。阿根廷是拉美第三大经济体，埃及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沙特是中东“头号石油国”，伊朗是中东重要的政治军事大国，它们与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

五大经济体印度、拉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俄罗斯共同携手合作、“强强联合”，必然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给“全球南方”带来巨大的生产、投资和消费机会，全球经济版图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在联合国 193 个会员中，大约 160 个为发展中国家。然而，“占世界人口 85% 的南方国家在全球决策方面仍处于边缘地位”。^① 扩员后的金砖国家致力于推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切中了全球治理体系不合理不均衡、治理能力不足的历史症结，契合了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诉求，必将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和支持。金砖国家重视并加强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多边机制的沟通与合作，这意味着“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话语权的极大提升。金砖国家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顺应了国际社会主流民意，代表了时代发展方向，势必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与支持。

总之，金砖国家既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又是“全球南方”的天然代表。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国际政治多极化、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格局深刻演进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未来，为应对世界之变、历史之变和时代之变，金砖国家应加强团结协作、互学互鉴、互帮互助，为构建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全球南方”的中东板块：历史逻辑与现实价值*

刘中民

一 “全球南方”概念持续升温的背景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

* 本文系 2022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和中东地区互动关系研究”（22JJD810023）的阶段性成果。

① Sumayya Ismail, “Can BRICS End ‘Apartheid’ against the Global South?”,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3/8/22/can-brics-end-apartheid-against-the-global-south>, 2023-09-20.

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国际社会围绕“全球南方”的含义和构成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一般而言，“全球南方”是国际社会中既具有明显共性又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群体。正如有关分析指出，“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而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但“全球南方”具有鲜明的“共同基因”，如拥有反帝反殖民的历史，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主张多极化，反对霸权、追求正义等特征。^①

事实上，“全球南方”并非新鲜的概念，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发布了《打造全球南方》报告，“全球南方”概念就是该报告的重要关键词。在“全球南方”概念之前，在国际社会便有“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等一系列概念，尽管其内涵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多在不同时期被用来指代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方面落后于西方，并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界定，“全球南方”包括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涵盖广大亚非拉地区。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功能而言，它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显然是侧重发展合作领域的经济范畴。但是，在近几年特别是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全球南方”不仅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话题，其内容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蕴意，其重要原因在于伴随国际格局剧烈变动，在冷战后国际地位一度遭到削弱的南方国家作为“中间地带”的战略价值迅速上升，而南方国家在大国博弈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中战略自主增强，使其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当然，南方国家作为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实力和作用的上升，也是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

因此，在当前的国际社会，无论是美欧西方国家以及南方国家自身，都在话语和实践层面争取“全球南方”的主导权，使其服务于自身利益和战略的需要。^②由此可见，“全球南方”概念背后既存在话语之争，也存在权力博弈。为表达中国对“全球南方”的理解和立场，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于2023年7月25日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专门就加

^① 《什么是“全球南方”？》，<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646149&sid=67>，2023-09-02。

^② 王辉耀、苗绿：《西方热炒“全球南方”概念，中国如何应对？》，载《环球时报》2023年7月20日。

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王毅表示，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王毅还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第一，要消除冲突，共建和平；第二，要重振活力，共促发展；第三，要开放包容，共谋进步；第四，要团结一致，共商合作。^① 2023年8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②

在东起阿富汗西至摩洛哥的广大中东地区，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为西方坚定盟友的以色列外，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归入“全球南方”国家的行列。中东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板块，既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更有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 中东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板块的历史逻辑

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代以来，伴随奥斯曼帝国衰落和西方殖民扩张，中东地区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中东地区体系具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无论是殖民时期的殖民统治和委任统治，还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中东国家的深刻影响，以及冷战后西方的“民主改造”和新自由主义对中东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强势干预，都使得中东国家的发展路径具有严重的外部依赖性。^③ 因此，长期以来，独立、和平、发展是中东国家的不懈追求，并使中东国家成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的重要成员，这也构成了中东国家在当今成为“全球南方”重要板块的历史逻辑所在。

第一，中东国家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形成了“全球南方”的政治底

① 参见《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

② 《“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运》，http://www.news.cn/world/2023-08/23/c_1129819576.html, 2023-09-02。

③ 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看中东困局》，载《环球时报》2020年11月3日。

色——独立自主。自19世纪以来，中东国家就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形成中东的独立民族国家体系。有学者根据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把20世纪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划分为3个阶段，即20世纪初期以土耳其、伊朗民族民主革命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为标志的“中东的觉醒”，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内容的“中东的抗争”，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反帝反殖斗争胜利、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为标志的“中东的巨变”。^① 总之，中东国家经历了长期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才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从而使其具备了独立自主的纯正政治底色。

第二，发展振兴作为“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构成了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懈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奥斯曼帝国寻求现代化的“坦齐马特”（原意为“整顿”）改革和埃及的阿里改革运动，到20世纪上半叶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二战后中东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到经历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和“阿拉伯剧变”阵痛后各国纷纷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愿景，^② 中东国家为实现发展振兴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进而使其与“全球南方”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

第三，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中东国家为实现公道正义广泛参与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作为“全球南方”的前身，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特别是亚非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构成了南方国家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并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东国家不仅广泛参与了南方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集体斗争和国际组织，而且建立和发展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地区性

^① 详尽论述参见王铁铮：《试论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载《西亚非洲》1991年第6期，第41~48页；刘中民：《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281页。

^② 关于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规划等问题的论述，可参见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哈全安著：《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万里等著：《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案例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 No. 24（2021~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和功能性的国际组织，为维护中东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阿富汗、伊朗、也门、沙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埃及、苏丹等一批中东国家参加了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积极推动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1961年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中，埃及与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加纳一起构成了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埃及开罗还承办了不结盟运动的筹备会议。中东国家也是1964年成立的七十七国集团的重要参与者，阿尔及利亚还于1967年主办了七十七国集团第一次部长级会议。^①更为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以中东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起了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以“限产、提价、禁运”为主要措施保护中东国家的经济权益，不仅极大地支援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斗争，更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

三 中东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板块的现实价值

第一，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中一支独立自主的重要力量。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对中东的干预、控制、侵略和渗透，使得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具有外部强加的典型特征，也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特点。^②如前所述，中东国家在近代以来为实现独立自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始终难以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外部干涉。

近年来，伴随国际体系内大国力量格局变化，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趋于多元平衡，地区国家的自主性上升，导致中东地区格局正呈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变化。^③伴随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战略竞争并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东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自主得到了极大提升。乌克兰危机

^① 关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具体情况，可参见李琮著：《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畅征、陈峰君主编：《第三世界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雷声著：《寻求独立、平等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See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6, pp.28-46.

^③ 刘中民：《重构中的中东地区格局：迎来和平发展“新气象”？》，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18期，第14页。

以来，在美国发起对俄罗斯谴责、围堵、制裁的过程中，中东国家的态度尽管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基本上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和政策，^①并未加入美国制裁和对抗俄罗斯的阵营，尤其是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美国盟国，并未简单按照美国要求行事，而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甚至敢于拒绝美国的要求（如石油限产），这一切都是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增强的体现。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利益，更使中东地区构成了维护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的重要“中间地带”。

第二，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中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由于西方采取分而治之、军事干预、代理人战争等政策对中东事务进行干预，导致地区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领土边界矛盾、地缘政治矛盾、民族宗教纷争异常复杂，酿成了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进而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冲突性特征，中东地区也成为和平赤字、安全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

但是，当前中东地区形势正在出现可喜的积极变化，进而使中东国家在消除地区冲突、维护地区和世界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伴随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并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中东地区大国在“阿拉伯剧变”以来面临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美、俄的战略博弈重点从中东转向乌克兰，促使地区国家纷纷进行战略调整。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出现了罕见的“和解潮”。^②特别是自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三方发表沙特与伊朗和解的《北京声明》后，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进而有利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③当前沙特、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已成为斡旋地区和国际冲突的重要角色。例如，土耳其在斡旋乌

^① 关于中东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可参见章远：《俄乌冲突与伊朗维持中东地区均势的对外行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42~57页；余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58~76页；杨晨：《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77~94页；吴诗尧：《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举措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95~116页。

^② 参见金良祥：《中东国家新一轮关系缓和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6期，第137~152页。

^③ 刘中民：《中国促成沙伊和解，推动中东和平发展新潮流》，载《光明日报》2023年4月5日。

克兰危机特别是达成黑海粮食运输协议方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沙特在召开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斡旋苏丹冲突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第三，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核心就是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进一步凝聚促发展的国际共识，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援助承诺，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①在促进发展问题上，中东国家不仅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同时更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

一方面，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辛探索和多次挫折之后，中东国家纷纷把发展转型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发展愿景，体现了中东国家实现发展的迫切愿望。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指引下，许多中东国家开始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其目标在于摆脱发展困境，破解民生难题，巩固政权和统治根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②开拓国际合作渠道，强化对外合作力度，推进发展规划的实施，^③构成了中东国家实施发展规划的重要特征，这势必促使其积极参与“全球南方”发展合作。

另一方面，中东国家已成为金砖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国际发展的合作重要伙伴。当前，金砖国家会议已成为“全球南方”最具实力和活力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对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截至 2023 年 8 月，已有超过 40 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 多个国家正式提出加入申请，其中就包括 9 个中东国家。在 2023 年 8 月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23 个国家正式申请成为金砖合作机制正式成员，最终峰会决定增加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联酋六国为成员国，其中埃及、伊朗、沙特、阿联酋四国为中东国家。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前首席经济学家纳赛尔·赛迪评价说，中东国家面临诸多经济领域的共同挑战，其中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发展和摆脱贫困等问题尤为关键，特别是多个产油国近年来致力于实现经济

① 参见《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

② 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 No. 24（2021～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 2 页。

③ 同上书，第 14 页。

多元化以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加入金砖机制对于这些国家制定符合其国情的解决方案来说大有裨益。^① 中东四国加入无疑将使“金砖发展成色更足、分量更重。”中东四国人口总和约2.3亿，进一步提升了金砖在国际上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四国已探明石油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34%，已探明天然气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27%，为金砖发展注入强大推动力和续航力；四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超过2.2万亿美元，货物贸易总额约1.9万亿美元，将为金砖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潜力和空间。^②

此外，中东文明的独特性、多样性也使中东国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文明互鉴、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伙伴。由于中东国家长期饱受外部干涉之苦，中东国家更是“全球南方”团结一致，共商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伙伴。

总之，中东国家在历史中形成了“全球南方”国家追求独立自主、发展振兴、公道正义的共同特征，在当前和未来“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中东国家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板块，并对保持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中东国家必将为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和共同利益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与“全球南方”发展合作的趋势与创新*

徐秀丽

“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本身意味着一种新型国际发展局势的形成，即一方面，二战后形成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内坚持自主发展的独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21&ZD1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十二年来金砖国家首次扩员 中东地区何以占据四席?》，<https://news.cri.cn/20230825/da5bd51b-fbeb-752d-6835-ef7618e723d4.html>, 2023-09-03.

② 《中东伙伴为金砖增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5832783128027522>, 2023-09-03.

意识不断增强，对自身历史、文化与制度在发展道路形成中的作用强化认识；另一方面，它们对外主动塑造全球或区域国际发展合作格局的意愿也不断加强，通过区域合作或联合自强不断增强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从而拓展其全球发展空间。此外，“全球南方”还体现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努力维系自身相对中立的国际身份再造能力，以及追求国际格局多元化格局的愿景。这些都为中国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智识图景和政治实践背景，且推动中国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治理的转型。

一 传统国际发展共识式微与新型南南合作的兴起

当前，尽管“发展”仍然是经合组织国家开展全球治理的四大支柱之一，但其含义和内涵却发生了诸多变迁。从组织架构上看，在世界援助大国的英国，较为务实的发展工作也被纳入到外交系统中，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理事会也需要更多地与经合组织中的全球关系与合作部相协调，这使得发展合作议程经常受到地缘政治议程的影响，出现了发展问题政治化的倾向；从资金流向上看，尽管近年来官方发展援助总经费上扬，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外，更多地流向了乌克兰危机中的人道主义援助、防疫抗疫、自然灾害等短期危机应对，而侧重长期目标的、关注非洲等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议程却被搁置，从而出现了所谓的发展问题边缘化的倾向；从合作机制上看，原先由发达国家主动发起的三方合作机制近年来进展放缓，南北发展合作对话机制逐渐淡出，而区域性、局部性、南南合作平台与机制加速重组，从而出现了发展动力不足、发展机制碎片化等倾向。

在此背景下，中国等新兴国家坚持高举发展与合作的大旗，尽力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平行的发展经验互鉴与发展合作实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自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后续陆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等国际公共产品，均为国际发展合作注入新动力，提供新动能，探索新机制、凝聚新共识。这一新型南南合作的勃兴与二战后传统南南合作相比，在如下三方面有所提升：首先，从合作范围看，不仅局限于早期零散的经济技术合作，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平台的搭建与全球治理机制的重塑。例如，中国以中非合作论坛创立为起始点，

目前已搭建起了包括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阿拉伯国家、东盟、中东欧、太平洋岛国等诸多“1 + N”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并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实践，不断落实这些机制。又如，2023年金砖国家扩容、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等，“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注重重塑全球发展治理机制，它们通过战略、工作计划、筹资框架和机构设置等不断推动新型南南合作的创新。2019年，非洲联盟开发计划署/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表了“第一份非洲南南合作报告”，被誉为非洲国家对于南南合作的突出贡献^①，成为非洲国家主动塑造全球发展治理话语的尝试。其次，发展合作规模与资金总量有所增加。以中国对外援助数量为例，2013年以来的近十年，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的规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平均水平的十倍^②，与此同时，援助在中国发展合作语境中更多是作为一种“催化剂”，带动了更多的经贸合作，这为新型南南合作提供了更多新资源。再次，新兴国家在自身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发展经验，形成了知识盈余，从而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平行发展经验分享，以此不断丰富非洲等区域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发展理念的重建。

二 “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意识愈发强烈

长期以来，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发展的界定和发展政策的制定受到北方国家的影响甚至支配，自二战以后，南北垂直导向的国际发展体系已经建立起包括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组织机制、评估标准、人才培养体系和学科建设体制等，具有很强的建制性，这些都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选择。与此同时，南方国家之间平行导向的合作机制却相对松散，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和能力，自身对于发展议程的把握也相对有限。在此背景下，南方国家尽管自冷战期间开始就具有谋求民族独立的意识，但其针对发展的财力、能

^① S. Haug & C. M. Kamwengo, “Africa Beyond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 Frame with Limited Reso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5, No. 4, 2023, pp. 549 – 565.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年1月），参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http://www.cidca.gov.cn/2021-01/10/c_1210973082.htm, 2023-08-19。

力和外部环境影响力却相对有限，因而其自身主导的发展计划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非洲国家制定了《拉各斯行动计划》，但由于国家财政资金困顿而难以推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所推动的“结构调整计划”所取代，后者在当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财力和话语资源。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理念重建、发展模式选择与发展合作方式拓展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参考力量；同时，由于南方国家之间的平行经验分享路径增多，基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经验参考价值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坚持自主发展的意识、路径和制度建设方面都获得了新的支撑点。以非洲为例，这种自主意识首先体现在对于自身规划和发展议程的制定上。自 2013 年开始，非盟制定了面向整个非洲大陆未来 50 年的《2063 年议程》，该议程以非洲大陆自 1963 年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以来的非洲自身发展战略规划和议程为基础，旨在推动实现非洲驱动、非洲拥有、促进非洲国家和大陆层次的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非洲大陆的总体性努力。^① 在此框架下，非洲各国也根据自身国情制定国别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如埃塞俄比亚的《减贫及可持续发展计划》、布隆迪的《2025 年愿景》、乌干达的《2040 年愿景》等。目前，非盟正在进行《2063 年议程》第一个十年的评估，拟启动第二个十年的具体规划。非洲的自主意识还体现在对于发展规划的执行能力上，一方面注重各规划在国家、次区域与大陆方面任务的层次性和衔接性，另一方面则关注提供发展金融的支持，更加注重国内税收汲取和管理能力，并在次区域层面建立了若干投资开发银行，同时推动了非洲贸易保险公司和投资担保公司等机构的运行。在非洲大陆层面，旨在以国内资源促进非洲基础设施优先项目融资的“非洲 50 年基金”可能成为非洲发展融资进程的关键里程碑，而非盟批准设立的非洲信用担保机构（ACGA）和非洲投资银行是非洲大陆的两个主要发展融资工具。^② 此外，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于 2021 年 1 月正式启动，

^①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简介》，参见非洲开发银行网站：<https://afdb-org.cn/projects-and-operations/high5s>，2023-09-18。

^② 联合国非洲经委会与非盟发展署：《新伙伴关系重振伙伴关系以促进非洲可持续增》，载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zh/magazine>，2023-08-19。

此举又进一步通过区域内贸易加强了区域间的整合，共同探索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时代，从而为其自主发展道路提供经济机制保障。^① 尤其重要的是，在涉及非洲大陆的共同问题和全球治理相关问题时，非洲各国逐渐形成共同立场，整体战略意识正在增强，非盟《2063年议程》的规划、执行与监测评估本身就是其中一部分。

三 “全球南方” 国家对新发展知识的关注不断加强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尤其体现在它们对于新发展经验和新发展知识的诉求上，这一诉求试图超越单一的西方现代化路径，而在各自文化和体制基础上寻求符合各国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构建更加多元、公正包容的全球治理新秩序。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一努力能否超越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二元对立的关系，发展为新型的、更富包容性的全球发展治理架构和国际发展合作模式，并从根本上拓宽更多元的发展中国家受益机制，且能有效应对当前全球共同挑战，从根本上则取决于这一集体新努力能否孕育出新型的国际发展知识体系。^②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发展知识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首先，越来越注重南方知识生产传统和文化脉络。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全球南方”视角审视现有的知识生产、权力和话语建构机制，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支持国民理解民族国家建构、殖民记忆重构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③ 近期，无论是印度欲改国名，还是非洲国家对于本土民族、文化传统和非洲精神的挖掘，都是推动自身传统与现代化进行结合的某种尝试和不同表达。其次，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区域性、全球性国际组织也越来越关注将南方的知识生产传统引入区域性、全球辩论、议程和成果。例如，经合组织关注如何将援助资源作为一种“催化剂”促进发展中国家自身内在的发展动力，从而推动了国际发展体系从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的转变。再比如，不管是联

^① 关于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框架内容与作用，参见朴英姬：《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进展、效应与推进路径》，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3期，第90~116页。

^② 徐秀丽、李小云：《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2期，第94~103页。

^③ 张倍瑜：《“全球南方”视角下的东南亚知识生产：以新加坡史为重点》，载《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第93~104页。

联合国，还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都越来越注重南南合作实践与知识在国际发展知识体系构建中的独特作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已建立起机制性咨询“全球南方”思想库的机制和渠道。再次，“全球南方”智库自身的影响力越来越引人注目。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近年来自亚非拉的智库数量大幅增长^①，这些智库网络与私营企业实体聚集，成为促进区域间知识共享的“倍增器”。非洲联盟发展署提出倡议，希望系统动员非洲智库，支持成功落实《2063 年议程》；建立非洲常设小组，其中包括非洲和二十国集团国家的智囊团，并就关键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展开更多研究和对话^②。2023 年，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也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全球南方”智库的影响力。

四 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坚持发展导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方，中国是上述“全球南方”合作趋势的积极引导者和深度参与者。在上述趋势的影响下，中国及早部署，推动自身对外援助体系逐渐向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发展治理转型，迄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特色的新型南南合作路径。

首先，为积极参与全球发展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国际发展合作模式的创新，中国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加大了对对外援助规模、改善了援助结构，并丰富了国际发展合作的渠道和合作对象。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外援助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没有使用统一的衡量标准，因此很难进行两者之间的简单比较。但总体来说，中国对外援助规模在总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仍然相对较低，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结构较为关注大型基础设施成套项目，优惠贷款所占比重较多。进入新时代以来，这一局面有所调整，在保持成套项目对外援助一定规模和优势的基础上，中国逐渐开始重视“小而美”的民心工程，并加大赠款比例，不断推进“全球南方”国家

① 《〈全球智库报告 2020〉发布》，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21-02/01/content_77175930.htm，2023-08-19。

② 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报告》，<https://unsouthsouth.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20th-session-of-HLC-ZH.pdf>，2023-08-19。

之间的新型团结和平行经验分享。^①从合作方式和对象看，长期以来，中国援助主要以双边为主，但近年来越来越关注多边国际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并加强与这些组织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

其次，为了尊重“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增强的自主发展意识、探索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在对外援助指导观念上也创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筑和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更加注重共同发展。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国际发展前沿话语的结合，表达了中国在南北发展对话和南南发展合作方面所秉承的开放思想和包容理念，也是中国在经历了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深度互嵌后、面对日益增加的全球共同挑战和风险时的明确主张，同时凸显了“全球南方”国家在此体系中的主动作为和积极贡献。

再次，从发展知识建设与分享上，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关注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和与世界各国发展知识互鉴。21世纪以来，中国设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之后又设立了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机制平台，并通过区域国别学、国际事务、全球治理与国际发展等新学科、新专业的设立，加强了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自身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的知识积累和人才培养。

综上，新阶段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动员更丰富的发展金融资源、并不断拓宽发展合作平台等机制，从而持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的含义、理念、政策与实践，而这些转型不仅体现在横向上对于国际发展合作与南南合作的创新，而且在纵向上拓展了“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机制和渠道，从而不断助力世界各国对于新型多元发展路径、发展知识，以及共商共建共享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探索。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全球发展治理机制仍然为自19世纪逐步建立起的北南国际发展框架所主导，“全球南方”国家间横向的新型南南合作将受到其自身经济发展能力、发展合作机制建设、发展知识凝聚与实践的多重挑战。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117~135页。